

世职和世袭是满族贵族维护其特权地位的一项重要措施。自天命五年论功序列为五爵后，几经更改，至顺治八年规定：“满洲官员开国以来，屡世从征，劳绩，……实授官员一概给与世袭诰命。”<sup>④①</sup>同年，又定世袭罔替制。这样，他们就可将其权势直接传其子孙，并且不允许朝臣、特别是汉官议论此类事情。顺治十四年，魏裔介因此而险些被赶出朝廷。

是年七月，魏裔介与满族同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能图等人题请“画一世职”。<sup>④②</sup>其疏略云：“除武功外，其别项授给世职，若应世袭，均应一体准其世袭。如不应世袭者，亦应一体不准其世袭。”顺治帝大怒，认为此事与“政治得失”无关。“伊等皆身任要职，明知久行定例，辄请更改，”“变乱成例，”

“情弊显然！”结果，魏裔介等人被革职，“戴罪留任，照旧办事。”

此后，魏裔介屡遭申斥，并被罚俸一年和革去太子太保及所加一级。对此，他却一如既往，力图振刷。顺治十七年六月，他疏劾大学士刘正宗与成克巩“相为比附”，“蠹国乱政”。<sup>④③</sup>顺治帝“览疏震怒”，同时对他不及早举劾也极为恼怒。于是，他们三人被一并革职，由刑部严审议罪。魏裔介再遭谴责之后，虽有议政王等疏其所劾多属事实，应免罪补用，但没有实现。他“势孤寡援，人咸危之”，暂时离开了政治中心。其时他潜心研究理学，辑刻自己的著述。显然，魏裔介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同顺治十四年第一次获罪时相比有了明显差别。他貌似超脱，实则是一种消极情绪的表露。但是，他尚未完全失望，希冀能有补用的时机。

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帝病逝，康熙帝即位，魏裔介等待补用的机会来到了。是年四月，补原官。康熙二年加太子太保，五月改升吏部尚书。次年十一月，再升内秘书院大学士。当时，辅臣鳌拜势焰日炽，四大辅臣之间论事每每争执，魏裔介则调和异同，“解

纷决策”，<sup>④④</sup>并在加派练饷等重大事件中力排众议，充分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

正当魏裔介致力于改革弊政、选拔人才<sup>④⑤</sup>之时，御史李之芳却于康熙九年五月对他严加弹劾，这次事件成了魏裔介一生的重要转折。

是时，康熙帝于不久前清除了鳌拜及其党羽，而李之芳疏参魏裔介的主要内容则是揭发他与鳌拜的亲信、大学士班布尔善“朋比相倚，各用私人”，“擅权害政”。<sup>④⑥</sup>吏部都察院在“遵旨会勘”后证明，李之芳此劾不实。至于疏参的其他内容，如魏裔介为其亲属升转职务，则确有其事，但事在康熙九年五月“赦前”，可以“勿论”。康熙帝虽有“嗣后宜勤慎供职”之旨，<sup>④⑦</sup>但却将他从吏部调出，补授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魏裔介以其多年的宦宦生涯，深知此次遭遇势将留下隐患。党附鳌拜之嫌虽属诬陷，并被否定，但是，他的最高官职确实是在鳌拜辅政期间升授的，这一事实不会不引起康熙帝的疑虑。信任既失，建言何易？况且，魏裔介的为官亲属因此次弹劾均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以上情况都使他感触颇多。经过痛苦的选择，他抱定“知止不辱，知足不殆”的宗旨，于康熙十年正月上疏“以病乞假”，康熙帝随即允之，“命回籍调理”。<sup>④⑧</sup>同一时期，当大学士图海等朝臣提出与魏裔介相似的请求时，康熙帝则“温旨慰留”。这种明显的差别证实了魏裔介的判断。同年三月，魏裔介离京，朝廷内外饯送者达数百人。这年他五十六岁。

自康熙十一年起，魏裔介家居十六年。次年，三藩乱起，对此，他早有预言，而朝廷也急需人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虽有“病痊起用”之旨，却始终未再任用这位两朝老臣。勿庸置疑，其中定有原故。但是，在清代官私史书中都没有答案，这一历经三百余年之谜在《康熙起居注》等档案史料中被揭开了。康熙帝指出：“魏裔介为人